

DRC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2014

丛书主编 ■ 李 伟

追赶接力

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

Into the Next Round of Chasing

*From Quantity Expansion to
Quality Upgrade*

张军扩 余 斌 吴振宇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2014

丛书主编 ■ 李 伟

追赶接力

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

Into the Next Round of
Chasing

*From Quantity Expansion to
Quality Upgrade*

张军扩 余 斌 吴振宇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张军扩，余斌，吴振宇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李伟主编. 2014)

ISBN 978-7-5177-0225-2

I. ①追… II. ①张… ②余… ③吴…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
模式—研究 IV. ①F12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8752 号

书 名：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

著作责任者：张军扩 余斌 吴振宇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7-5177-0225-2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

联系电话：(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bianjibul6@vip.sohu.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DRC

201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李 伟

副主编：刘世锦 韩 俊 张军扩 张来明 隆国强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宁宁 马 骏 卢 迈 叶兴庆 包月阳

吕 薇 任兴洲 米建国 刘世锦 李 伟

李善同 余 斌 迟福林 张小济 张军扩

张来明 张承惠 陈小洪 侯永志 赵晋平

赵昌文 高世楫 夏 斌 郭励弘 隆国强

程国强 程秀生 韩 俊 葛延风

总 序

积极发挥智库作用 全力为改革服好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去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篇章，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改革的成功，需要正确的方向和可行的方法。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既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又找到了可行的方法。进入新时期的改革，涉及面更为广泛，调整利益格局更加艰难。我们必须以全球视野、战略思维，深化改革理论研究，密切结合世情国情，积极关注社情民意，科学认识全球结构调整和体制变革的方向、趋势，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众诉求，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升驾驭改革的综合能力，确保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圆满完成。为此，需要特别

处理好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与发挥各方创造性、积极果敢与稳妥推进、效率与公平、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等方面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是处理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而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当前改革的主要矛盾方面。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表面上看是速度的换挡与调整，但在本质上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我国经济能否在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上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关键在于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今年以来，我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局部风险开始显露的同时，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表现为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就业状况不断改善等。这些积极变化也反映了我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改革举措有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分，有见效慢和见效快之别。在抓好相对慢变量重大改革的同时，适当加大需求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发挥扩需求、稳增长的作用，与促进需求政策形成合力效应，通过换机制、调结构，着力培育增长新动力。

具体而言，近期，应以调整投资结构、稳定投资增速、化解金融风险为重点，积极推进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和政策调整。如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推进地方政府合规融资；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作用；推动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做好舆论引导、风险隔离、社会保障等配套工作，积极化解局部风

险；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结合，积极推进加速折旧；治理产能过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等。

中长期，则应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大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推动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的基础产业领域改革，提高非贸易部门的效率；围绕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土地、金融、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改革，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破除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适当提高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和当年财政赤字率，利用中央政府的负债潜力，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现实的债务压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去年4月和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智库建设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求我们要紧紧围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任务，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智库机构，在过去一年中，紧紧围绕中央的工作中心，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立足全局、突出重点、发挥优势、创新体制，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全面推进“一流智库”建设为抓手，以提高政策咨询研究的

质量和水平为重点，坚持中长期重大课题研究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相结合，完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新政策新举措，为中央决策服务取得了新成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迄今已是连续第五年出版。五年来，我们获得了各级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读者的热情关注与支持。特别是去年的丛书出版后，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这是对我们继续做好工作的重要鼓励与鞭策。

今年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共 16 部著作。其中：《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 ~ 2014 年度的重大研究课题报告，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路径与方法；《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突出矛盾与未来走向》等 10 部，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研究部（所）的重点课题研究报告；此外，还有《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创新》等 5 部优秀招标课题研究报告。

这套丛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过去一年研究成果的优秀代表，但其中可能还存在着种种不足。衷心期望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开创政策研究咨询工作新局面、努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好务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4 年 8 月 18 日

序 言

Preface

这本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 年度重大研究课题“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目的与基本结论

开展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在于从比较宏观的视野，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增长潜力和增长前景做出客观评判，对增长阶段转换的性质和特征做出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为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所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所需要推进的改革举措。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年度增长数据，从 2003 年到 2007 年的 5 年间，中国经济连续实现了 10% 以上的增长速度。2008 年增速从去年的 14.2%，大幅回落至 9.6%，2009 年进一步降至 9.2%。由于采取了超大力度的需求刺激政策，2010 年增速又回升到 10%

以上，为 10.4%，但好景不长，回升乏力，从 2011 年开始，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1 年为 9.3%，2012 年和 2013 年均为 7.7%，2014 年预期目标确定为 7.5% 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 2008 年以来的增速回落，如何看待现阶段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及政策研究领域十分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虽然不同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研究的重点等各有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多种多样，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增速回落主要是经济景气循环、结构矛盾制约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化，仍具有高速增长的条件和潜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 2008 年以来经济增速的回落有外部冲击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更本质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不再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和可能性，并会很快回落至低速增长水平。

本课题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既不像上述第一种意见那样乐观，也不像第二种意见那样悲观。课题组认为，一方面，经过 30 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确正在发生变化，现阶段的增速回落并不仅仅是景气循环和外部冲击等短期因素所致，也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因素的影响，因此，再回复到以前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具备；但另一方面，基于对我国发展实际及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追赶型增长进程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后发优势性质、结构和程度的变化和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因此，尚不会使我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课

题组认为，在今后大约 10~15 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 6%~8% 的中高速增长潜力。

课题研究还表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而是同时意味着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为此做出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的、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那么不仅中高速增长潜力不会变为现实，经济也有可能很快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关键还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

二、后发优势与追赶型增长

得出以上判断，首先是基于对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一般规律的研究。之所以首先研究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的规律，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属于一个落后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要把中国问题说清楚，首先就要把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说清楚。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

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比如，据研究，美国在过去的大约 180 年的时间里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3% ~ 4%^①。这种增长可以形象地称之为“蜗牛爬行式”增长。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或者，换个角度说，常常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前沿国家在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增长任务。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日本和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韩国。这种增长被称为“压缩式增长”^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即追赶型增长或压缩式增长。

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压缩式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简单讲，就是指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拥有的增长潜力和增长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表现在对先进技术、制度、管理经验等的学习、引进、借鉴等方面，也可以表现在较低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源要素的成本方面，还可以表现在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潜力等方面。当然，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只是追赶型增长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体制及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后发优势与压缩式高增长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

① 其中大约一半为技术进步因素，另一半为人口增长因素。

② 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

条件。就是说，没有这种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压缩式高增长，而仅有后发优势，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压缩式高增长。正因为如此，许多非洲国家都具有后发优势，具有高增长的潜力，但由于其他条件不具备，因此并不能实现高增长。

三、追赶型增长的两个显著特征

既然追赶型增长的潜力来源于后发优势，因而后发优势的大小，就决定了追赶型增长潜力的大小；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的这种变化，使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过程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即，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启动前，一般是传统经济状态下的低速增长，其增速有可能比前沿国家的增速还低。而追赶型增长进程启动后，增速迅速提高，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并会持续一定时期。而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发展差距和后发优势消失，增速回落至前沿国家水平。不难看出，由后发国家增长的追赶性质所决定，增速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内生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只要实现成功追赶，增长速度就必然会收敛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水平。当然，也可能追赶不成功，在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前沿国家水平前而增速掉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落入了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增长陷阱了。

二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追赶过程中发展水平的提高

不会从低收入直接跨入高收入，后发优势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是一个由低到高渐变的过程，而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压缩式增长动力和增长潜力的变化。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其压缩式高增长过程都不是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转入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有些经济体能够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速增长，实现的平均增速也相对较高，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从1953年到1979年27年的年均9%左右的高速追赶之后，还维持了自1982年至1997年长达16年之久的年均7.3%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另一些经济体中速增长持续时间则相对较短，实现的平均增速也相对较低。比如，韩国在从1963年到1997年的35年时间里，平均增速达到8.2%，而在此后的自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里则实现了5.6%的中低速增长。再比如日本，在1946年到1973年的27年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长，而在此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时间里，年均增长率只达到4.4%的中低增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速增长期究竟能持续多久，能够实现多高的平均增速，不仅取决于其增长潜力，也取决于当时一系列的国际、国内环境及条件。进一步观察我国台湾地区及韩日两国增速明显回落、出现增长阶段转变时的发展水平及与前沿国家的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可以发现其相互之间不仅不完全一致，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进一步说明，对于相对差距、后发优势、增长潜力和现实增速之间的影响和决定关系，我们决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和类比，而必须根据历史和

现实状况做更加深入的研究。相对差距和后发优势决定压缩式增长的潜力这一点从理论上说没有问题,但这个潜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因而能够实现多长时期、多高水平的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阶段转化何时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等等,都不仅取决于增长潜力的变化,也取决于其他一系列内外部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变化和影响,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考察。

四、追赶型增长阶段变化的动因与机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追赶型经济体增速阶段性变化的内在动因、机理及其对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意义,课题组根据对国际、国内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追赶进程与后发优势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根据追赶进程中发展水平提升、增长环境和后发优势变化、效率改进方式和增长动力转换等影响关系,概括总结了追赶型增长进程中与增长阶段转换相联系的三种动力机制和增长形态,即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创新引领型中低增长。

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资本积累+TFPI)。追赶进程启动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环境的基本特点是:①要素供给条件非常宽松(比如,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土地资源丰富,大量的优质矿产资源有待开发,环境生态问题尚不构成对增长的制约,等等)。②需求空间巨大,国际市场几乎空间无限,而国内市场也存在大量的供给空白有待填补。③存在大量的可以免费使用的适用技术或技术引进成本较低。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很自然地会主要依赖

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大量的新企业、新产能产生，而较少有企业和产能被淘汰。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增加，效率的提高则主要是通过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转向高效部门实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可称为TFP1。实现TFP1，企业和社会所支付的成本低，从而有更多经济剩余投入积累，从而形成高投资、高增速相互增强的局面。

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TFP1 + TFP2）。经过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与前沿国家的发展差距也会明显缩小，这时，与追赶进程初期的情况相比，经济环境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主要是：①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要素供给对增长的制约显著增强（比如，虽然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较低、优势仍在，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虽然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价格也相对较低，但价格也快速上升，对粗放式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容量越来越成为粗放增长的硬约束）。②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显著增强。虽然国内基础设施、工业设备投资、房地产投资等仍有增长空间，但与追赶型增长初期的情形相比，空间已经明显缩小，增速也显著放慢，有些地区和领域增长空间已相对饱和，进入质量提升或更新换代阶段。消费品市场需求方面虽然也有较大的扩大和提升空间，但追赶增长初期那种广泛存在的市场供给空白点已经基本不存在，更多的是升级换代的需要。出口市场方面，追赶初期，由于经济体量小，出口占全球份额有限，但随着出口份额的不断增加，对全球市场影响越来越大，受全球市场制约也越来越明显，这一点对像中国

这样的大国尤其明显。③技术差距虽然依然较大，但像追赶型增长初期那样适用的免费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少，技术引进不仅成本上升，而且难度增加。在这样的条件下，过去那种以简单的数量扩张型粗放增长为主的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需要转向主要依靠质量的提升和效率的提高来推动，而效率的提高除继续来自于资源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TFP1）外，将会越来越多地依靠行业内部企业之间和不同技术产能之间的优胜劣汰（TFP2）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优胜劣汰，新的企业、新的产能的出现往往会导致旧的企业、产能被淘汰而退出市场，而不像追赶初期那样新产能的出现并不需要大量淘汰旧的产能。

创新引领型中低增长（TFP2 + TFP3）。追赶进程的后期，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进一步缩小，增长环境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主要是：①工资和其他要素的价格虽然还不及前沿国家水平，但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范围内基本丧失比较优势。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②需求方面，城市化水平接近峰值，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的建设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主要是更新换代和质量提升问题。消费品市场也基本饱和，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突破，也只能是更新换代。出口方面，大多数出口产品已经是与技术前沿国家的中低端产业的竞争，因此，贸易摩擦不断。③技术方面，技术引进不仅价格高昂，而且由于越来越接近技术核心，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多，引进的难度越来越大。④与此同时，不论是从技术水平、人才队伍，还是从产业基础、资金实力来看，进行前沿